

doi:10.3969/j.issn.1672-4348.2021.02.017

# 二十世纪以来出土文献对古代小说研究的贡献

陈琴容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 二十世纪以来,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和刊布为古代小说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采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可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脉络,溯源古代小说文体的发生,考订志怪小说的流变,厘清具有叙事性、形象性、虚构性等特征的故事俗赋与小说文体的联系。利用出土文献开展古代小说研究,不仅可以拓展和深化古代小说研究,而且也可以为今天的小说、戏剧创作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出土文献;古代小说;发生;流变;俗赋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21)02-0199-06

## Contributions of documents unearthed since 20th century to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novels

CHEN Qinrong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a large number of unearthed documents have been found and published, which provide abundant materials for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novels. The adoption of the “double evidence method” which combines the unearthed literature and the handed-down literature, can help re-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novels, trace back to the origin of ancient novels, examine the evolution of the supernatural novels, and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lklore with narrative, figurative and fictional features and the novels. Using unearthed documents to carry out the study of ancient novels can not only expand and deepen the study of ancient novels, but also provide enlightenment for today’s novel and drama creation.

**Keywords:** unearthed documents; ancient novels; origin; evolution; folklore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首次提出小说界革命,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sup>[1]</sup>。新文学运动中,小说的地位和重要性继续得到强调,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但是,由于中国古代小说地位卑下,历来不受公卿列士的重视,导致小说类文献散佚严重。为了进行小说研究,学者们在小说文献资料的辨伪、辑佚和整理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例,《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小说文献整理工作是这一著作的重要基础,《中国小说史略》的问世,填补了

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一项空白。

二十世纪以来小说研究史料的发掘和发现,成就斐然。其中,敦煌遗书的发现,尹湾汉墓竹简、天水放马滩秦简、上博简、清华简、北大简等简帛的出土和刊布,为学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小说研究材料。学界运用出土文献研究古代小说的专著与论文不在少数。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开篇即言: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

收稿日期: 2020-11-23

作者简介: 陈琴容(1996—),女,福建平潭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佛本行集经演义,维摩诘经菩萨品演义,八相成道变,地狱变等,有关于小说文学史者也。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等,有关于佛教故事者也。<sup>[2]</sup>

作为“敦煌学”的提出者,陈寅恪较早提出了出土文献与小说之间的关系。同时期还有容肇祖《敦煌本〈韩朋赋〉考》一文,探究敦煌本韩朋故事与《搜神记》所记载《韩凭妻》之间的关系。后来者如蔡先金在《简帛文学研究》中独列“简帛古小说”一章探究《赤鹄之集汤之屋》《晝夜》《丹复生记》《田章传说》《韩朋故事》等出土文献与小说的关系;伏俊琰、廖群对敦煌俗赋有着独到的见解,认为俗赋与小说虽形式不同,但其中的叙事因子却是异曲同工;李建国在《唐前志怪小说史》中认为《汲冢琐语》为“古今纪异之祖”;苗江磊、黄德宽、王洪涛等学者均以出土文献为依托探索古代小说问题。

所谓有新材料必定有新发现,采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能够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脉络,寻绎小说这一文体的发生和演进规律,解决小说研究中的诸多争议,从而建构起更加全面系统的中国古代小说史。

## 一、溯源古代小说文体的发生

对于小说起源,历来众说纷纭。“小说”一词首次见于战国中期《庄子·外物篇》:“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鲋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sup>[3]</sup>此处“小说”指的是小道理,还未形成文体概念。“知者道论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sup>[4]</sup>战国末期《荀子·正名篇》中的“小家珍说”亦如此。到了东汉时期,桓谭《新论》语:“庄周寓言,乃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亦皆为妄作。故世人多云:短书不可用。然论天间莫明于圣人,庄周等虽虚诞,故当採其善,何云尽弃耶?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sup>[5]</sup>可认为桓谭将庄子寓言、《淮南子》中虚诞妄作的传说视为小说。

东汉班固将小说家列为末家,认为:“小说家

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当尧狂夫之议也。”<sup>[6]163</sup>由此可见,小说创作者的官职不高,内容以街头巷语、道听途说为主,称之为“小道”。班固注《伊尹说》云“其语浅薄,似依托也”<sup>[6]159</sup>,注《青史子》云“古史官记事也”<sup>[6]160</sup>,注《黄帝说》云“迂诞依托”<sup>[6]161</sup>,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解释:“惟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sup>[7]</sup>此小说定义成为传统目录学的经典性概念。

但小说十五家之文本均不存,故有部分学者以此认为先秦无小说。出土文献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很好地解决了这一谬说。这篇文献发布后,学者们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其小说的文体属性。例如,黄德宽先生认为,这篇佚文具有明显的小说文体特征,它的发现“有可能改写文学史家关于先秦无小说的结论”<sup>[8]81</sup>。刘成群进一步分析认为,《赤鹄之集汤之屋》具有浓厚的巫术色彩,但后来应当经过了战国时代楚人的增饰,就其情节的曲折等看,当归属于小说,而且是属于“先秦杂史体志怪小说的范畴”<sup>[9]</sup>。《赤鹄之集汤之屋》讲述了小臣伊尹因将赤鹄汤羹送给汤王妻子纡荒饮用从而得罪汤,逃往夏国。被下魅术的伊尹在途中被灵乌所救,并从灵乌处得知夏后病之缘故,假称天神解帝之巫术。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是否出于古史官记事,仍存疑,但可以确定非真实事件。参考《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的“古史官记事”“迂诞依托”,把《赤鹄之集汤之屋》视为小说较为妥当。在时间上亦属于中国最早的小说文本。借助《赤鹄之集汤之屋》的讨论可知,中国小说的源头当在先秦。

## 二、考证志怪小说的流变

不少与小说有关的出土文献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产生重要影响,显现其流变。比勘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可以寻得古代志怪小说的流变。

(一)《赤鹄之集汤之屋》《丹复生记》《泰原有死者》与志怪小说的源流

《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列为“末家”,可见在

汉以前,小说尤不受重视,但这并不说明小说不被人们所接受,在当时严肃、乏味单调的官场生活中,小说何尝没有为知识分子暂时摆脱尘世提供一些心灵安慰呢?只不过这类作品难与温柔敦厚、教化讽喻为主的主流文学观点契合,因而难登大雅之堂。

一般认为志怪小说产生并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李剑国《中国小说通史·先唐卷》认为陈实所撰《异闻记》标志着杂记体志怪小说的产生<sup>[10]</sup>,但《赤鹄之集汤之屋》的出土似可以把志怪小说的产生时间大大提前。将《赤鹄之集汤之屋》与魏晋志怪小说《搜神记》中的《三王墓》《韩凭妻》相关情节作比较可知,它已十分接近魏晋的志怪小说。《三王墓》记载:“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蹕出汤中,蹕目大怒。”<sup>[11]</sup><sup>128</sup>《韩凭妻》云:“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sup>[11]</sup><sup>141</sup>

《赤鹄之集汤之屋》相关情节为:

帝命二黄蛇与二白兔,居后之寝室之栋,其下舍后疾,是使后焚焚眩眩而不知人。帝命后土为二陵屯,共居后之床下,其上刺后之身,是使后昏乱甘心。后如撤屋,杀黄蛇与白兔,发地斩陵,后之疾其瘳。<sup>[12]</sup>

《赤鹄之集汤之屋》运用当时的天命巫术说,使其情节更为奇幻与怪异。黄德宽先生分析《赤鹄之集汤之屋》的人物关系与基本事件,认为可将其看作“说实话的(至少作者自以为)”传统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sup>[8]</sup><sup>84</sup>在这一层面来说,《赤鹄之集汤之屋》可视为志怪小说的起源之一。

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丹复生记》记载一个名叫丹的人的故事。丹是战国时魏国将军犀武的舍人,曾在韩国将人刺伤,然后自刺,被判弃市。埋葬三年后,丹因罪不应死而复活,其过程乃是司命的下属公孙强派白狗将丹掘出坟墓,三天后丹又随公孙强北行至赵国的柏丘,呆了四年才能听到鸡狗之声并正常饮食,但四肢仍不能转动。丹还讲述了很多鬼世界的习惯,并告诉人们应如何祭祀才能让鬼神得以歆享祭祀之物。<sup>[13]</sup>同为死而

复生的还有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故事与《丹复生记》多有共同之处,同为虚幻,亦可视为志怪小说的起源之一。

## (二)《赤鹄之集于汤之屋》与《搜神记》之管辂故事

2016年公布的清华战国楚简中的《赤鹄之集于汤之屋》,记述商代名臣伊尹的故事,虽然与先秦文献中散见的伊尹故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大体上差异明显。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中的伊尹因被商汤之妻纣威胁不得不品尝赤鹄羹而冒犯汤,与《墨子》《史记》《天问》中记载的“伊尹以烹饪之道喻治国之道,接近汤并成为汤的辅佐”大相径庭。典籍文献中的伊尹故事有着明显的政治色彩,而《赤鹄之集于汤之屋》有着浓厚的巫觋色彩,非常符合《礼记·表记》中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sup>[14]</sup>之说。只不过诸子在借用伊尹故事时,仅用其政治功用,而去其巫术色彩。

《赤鹄之集于汤之屋》篇中天帝对夏桀的惩罚方式在后世志怪小说中同有影子出现,如《搜神记》卷三载的一则管辂故事:

信都令家,妇女惊恐,更互疾病,使辂筮之。辂曰:“君北堂西头有两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头在壁内,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头,故头重痛,不得举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悬痛,不得饮食也。昼则浮游,夜来病人,故使惊恐也。”于是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远,木皆消烂,但有铁及角完耳。乃徙骸骨,去城二十里埋之,无复疾病。<sup>[11]</sup><sup>34</sup>

这与上文所引《赤鹄之集汤之屋》中所载的情节类似,同属于受制巫术、解除巫术的过程。但是相比较而言,《赤鹄之集汤之屋》篇首交代伊尹出逃原因,篇中通过灵乌之口透露夏后生病的来由,文中人物之间的对话亦是生动有趣。整篇的情节冲突更加鲜明,更具戏剧性;而《搜神记》的管辂故事更接近于对事件的直接阐述,不包含进一步的矛盾冲突与人物形象的刻画。干宝自序“考先志于载籍”<sup>[11]</sup><sup>2</sup>,可以推测干宝可能是从此获得的灵感。

### (三)“玄鸟换太子”与“狸猫换太子”

“狸猫换太子”故事定型于清代说书艺人石玉昆所编的《三侠五义》中。这一故事的源头可追溯到西晋初年出土的《汲冢书》，现可见于严可均所编《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五末之《古文周书》中的“玄鸟换太子”故事：

周穆王姜后昼寝而孕，越姬嬖，窃而育之，毙以玄鸟二七，涂以彘血，置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发书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飞集于户。鸿之戾止，弟弗克理。重灵降诛，尚复其所。”问左史氏，史豹曰：“虫飞集户，是曰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谓关亲，将留其身，归于母氏，而后获宁。册而藏之，厥休将振。”王与令尹册而藏之于椟。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复，言其情曰：先君怒予甚，曰尔夷隶也，胡窃君之子，不归母氏？将置而大戮，及王子于治。”<sup>[15]</sup>

可以说，这基本上已是一则完备的“狸猫换太子”式的故事<sup>[16]</sup>，只是置换物之间的差异。有学者将此故事渊源与佛经相关联，探究其借鉴之处。但伏俊琰研究早于佛经故事的战国文献，发现“狸猫换太子”完全是中国式故事，是内部文学的传播继承。无论是“玄鸟换太子”还是“狸猫换太子”，均是完整的故事脉络，其中所形成的叙事性、虚构性、形象性既符合小说的文体属性特征，也合乎“迂诞依托”的小说文类属性。

### (四)《田章简》与句道兴《搜神记》

敦煌汉简——田章简释文如下：

“……君子？”田章对曰：“臣闻之：天之高万万九千里，地之广亦与之等。风发谿（溪）谷，雨起江海，震……”<sup>[17]</sup>

短短两句简牍引发激烈讨论的原因是有关田章的故事，通过敦煌石室藏句道兴残本《搜神记》的田章故事可知，有一名为“田昆仑”的男子和天女生下一子名为田章。因其出身不凡，获得天书八卷，智力超群，位极人臣，但因殿内犯事而被流放。田章身世十分离奇，成长过程中得到了天公

的帮助，获得奇异功能，无所不知。但凡无人知晓之事，人们皆问之田章。

蔡先金先生研究发现，《搜神记》田章故事与《田章简》不但主人公的名字一致，而且连叙述方式、夸张手法也相似，如《晏子赋》与“田章”的有关片段及《孔子项托相问书》，虽主人公不是田章，但对话式叙事模式是一致的。蔡先生再通过《晏子春秋》与《搜神记》中虚妄之辞做比较，得出结论：《田章简》源自《晏子春秋》，又是敦煌变文的故事源头，有着清晰的脉络可寻。<sup>[18]</sup>可见，《田章简》在田章故事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特别是对《搜神记》这一志怪小说的素材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

### (五)睡虎地秦简《日书·诘咎》与干宝《搜神记》

《日书》是古人从事各项活动时选择时日吉凶宜忌的参考书目，形如现世依旧流传的黄历。先秦巫文化的盛行，使《日书》中不乏对鬼怪的记载。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记录了一篇驱鬼术的文章——《诘咎》。据刘钊统计，《诘咎》包含40余种鬼怪类型，<sup>[19]</sup>散见于古书《淮南万毕术》与敦煌遗书《白泽精怪图》，<sup>[20]</sup>其特别之处在于记录了对付鬼怪的方法，并且在《搜神记》中屡见其踪迹。

《诘咎》中“豕矢”“犬矢”与《搜神记》之《宗定柏》“不喜人唾”，同是使用秽物驱鬼。《诘咎》“烹而食之”与《搜神记》之《三王冢》“煮头三日三夕”，同是烹煮之法。《诘咎》篇所使用到的剑、笔、灰、石等驱鬼的器物在《搜神记》中可见原型。由此可见，先秦人民的巫术文化在后代小说的演变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正因为《日书》作为工具书在民间流传甚广，所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于巫文化的接受及文学创作。

## 三、俗赋与小说的关系

赋作为一种讲究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性的文体，特点为“铺采摘文，体物写志”<sup>[21]</sup>，具有中国传统文学的色彩，就文体而言，显然与小说有别。但自敦煌石窟发现以后，有别于汉魏六朝文人赋的俗赋——唐代民间艺人在传统杂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白话韵文，横空问世。故事俗赋因其叙事性、形象性、虚构性与小说文体联系在一起。

敦煌遗书中的俗赋共有17篇,另还有一则《苏武李陵执别词》未被伏俊珪先生收录。伏先生将俗赋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故事类俗赋,如《韩朋赋》《燕子赋》;二是论辩类俗赋,如《晏子赋》《孔子项托相问书》《茶酒论》《齏齏新妇文》;三是咏物类俗赋,如《酒赋》《龙门赋》《月赋》《子灵赋》《驾幸温泉赋》《贰师泉赋》《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秦将赋》《渔父歌沧浪赋》《丑妇赋》。<sup>[22]</sup>未被收录的《苏武李陵执别词》可收入咏物类俗赋。

从叙事性出发,《韩朋赋》具有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韩朋与贞夫结为夫妇后不久,便出使宋国,六年未归。贞夫寄出的情书被宋王扣留,并被骗往宋国。宋王欲立贞夫为后被拒,对韩朋用刑逼其就范,使得夫妇二人先后自杀。死后宋王不允二人葬于一处,但二人墓前分别长出的大树根相连、叶相笼,落屑化为鸳鸯,情节曲折,扣人心弦。

从形象性出发,《丑妇赋》通过多处正侧面描写,塑造丑妇形象:述其“无兮利之伎量,有妒毒之精神”<sup>[23]</sup>,闲暇时“则如能穷舌”,嘴馋时“馋则佯推有娠”,“耽眠嗜睡,爱斧憎薪”为其生活习惯,如长舌妇一般“尔乃只爱说非,何曾道是”,热衷于挑衅“闻人行兮撼战,见客过兮自捶”,打人也不在话下,如“打女而高声怒气”……如此这般,一个外貌丑陋、品性不端的妇人形象跃然纸上。

从虚构性出发,《燕子赋·甲篇》赋予燕子、黄雀、凤凰等动物以人的属性,如《庄子》寓言,通过想象虚构的方法勾勒出“维鹊有巢,维鸠居之”的雀占燕巢之事,但它比寓言更加深刻,其中包括雀儿言说自己的关系网以及鸬鹚前去逮捕时黄雀利用各种手段再三推脱等,充满讽刺抨击意味,揭露了当时封建统治社会的黑暗。全篇虽运用四言问答韵言赋体,但却充满了小说的味道。

由上可知,叙事性、形象性、虚构性的通俗小说影子在敦煌俗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根据尹湾汉简、北大汉简等出土文献,俗赋不仅出现在敦煌遗书中,其出现的时间可往前推移,大致在两

汉时期就已盛行。1993年,江苏东海县尹湾西汉墓葬中出土了一篇《神鸟赋》,与《燕子赋》类似,赋予动物以人的属性讲述了一对雀鸟的故事。无独有偶,北大汉简中也发现了一则较完整的古诗类俗赋——《妄稽》,该赋围绕丑女妄稽、周春、虞士展开故事情节,以妒女临死忏悔为结局。无论是《神鸟赋》抑或《妄稽》都具有较为完整的叙事性与虚构性,说明汉代已出现类似小说的俗赋。

关于汉代俗赋、故事赋,廖群在《汉代俗赋与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研究》《“俗讲”与西汉故事简〈妄稽〉〈神鸟赋〉的传播》中,结合《神鸟赋》《妄稽》<sup>[24]</sup>、韩朋故事残简、汉代史书、故事书中的类俗赋(如《史记·龟策列传》中的神龟故事、《列女传·节义传》所载《鲁秋洁妇》《韩诗外传》中的“阿谷处女”),加之出土文物——汉代说书表演俑,得出结论:韵散结合的作为讲诵底本的故事赋,在汉代一定是大量存在过的。俗赋与小说最大的不同在于成文体制不同,俗赋更多应用于口头的吟诵、娱乐,以韵文为佳;小说偏向于书面,辞章少韵或不韵。<sup>[25]</sup>可以说,二者虽然存在体制上的差别,但是俗赋中的故事因子却给予小说极大的发展空间,相交的共同点促使小说文体往更精细的方向发展。

## 四、小结

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开始,再经过新文学运动的提倡,小说的地位得到极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发展。十九世纪以来与小说研究相关的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在小说研究的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可在地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的相互发掘中,对小说文体的发生、题材的流变、与域外文化及文学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这不仅可以拓展和深化古代小说研究,而且也可以为今天的小说、戏剧创作提供许多有益的参考。

##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M]//舒芜. 中国近代文论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157.
- [2] 陈寅恪.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M]//陈美延. 金明馆丛稿二编.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1: 266.
- [3]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 1961:925.
- [4] 梁启雄. 荀子简释[M]. 北京:中华书局, 2009:324.

- [5] 朱谦之. 新辑本恒谭新论[M]. 北京:中华书局, 2009:1.
- [6] 陈国庆. 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 [7] 周锡山. 中国小说史略汇编释评[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3.
- [8] 黄德宽. 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先秦“小说”:略说清华简对先秦文学研究的价值[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55(4):81-86, 168.
- [9] 刘成群. 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文体性质再探[J]. 学术论坛, 2016, 39(8):100-105, 129.
- [10] 李剑国. 中国小说通史·先唐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154.
- [11] 干宝. 搜神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 [12]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M]. 上海:中西书局, 2012:167.
- [13] 孙占宇. 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M].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3:269-276.
- [14] 杨天宇. 礼记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724.
- [15]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 北京:中华书局, 1958:109.
- [16] 伏俊琰, 刘子立. “狸猫换太子”故事源头考[J]. 文史哲, 2008(3):75-79.
- [17] 裘锡圭. 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394.
- [18] 蔡先金. 简帛文学研究[M]. 北京:学习出版社, 2017:595-601.
- [19] 刘钊. 谈秦简中的“鬼怪”[J]. 文物季刊, 1997(2):59-63.
- [20] 刘乐贤. 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M]. 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4:265.
- [21] 刘勰. 文心雕龙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134.
- [22] 伏俊琰. 俗赋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 2008:292.
- [23] 伏俊琰. 敦煌本《丑妇赋》与丑妇文学[J]. 敦煌研究, 2001(2):123-127.
- [24] 廖群. “俗讲”与西汉故事简《妄稽》《神鸟赋》的传播[J]. 民俗研究, 2016(6):90-96, 159.
- [25] 廖群. 汉代俗赋与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研究[J]. 理论学刊, 2009(5):116-120, 128.

(责任编辑:王圆圆)

(上接第 145 页)

## 参考文献:

- [1] 谢花林, 舒成.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研究现状与展望[J]. 环境保护, 2017, 45(17):12-17.
- [2] 程雪阳.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行使机制的完善[J]. 法学研究, 2018, 40(6):145-160.
- [3] 刁其怀. 产权界定与西部自然资源利用:对西部自然资源利用机制的反思[J]. 云南社会科学, 2011(1):97-100.
- [4] 马永欢.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自然资源管理制度改革研究[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7:15-40.
- [5] 叶榭平. 新体制下自然资源管理的制度创新与法治保障[J]. 贵州省委党校学报, 2019(1):14-20.
- [6] 崔莉.“生态银行”研究与实践——以福建南平市为例[M].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9:49-53.
- [7] 马永欢, 吴初国, 林慧, 等. 完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研究[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9, 34(1):60-70.
- [8] 罗薇. 协商与共赢:自然资源利用集体行动中的财产权研究[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9:157-162.
- [9] 谢高地, 曹淑艳, 王浩, 等.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发展趋势[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4(5):161-166.

(责任编辑:许秀清)